

在故纸堆中焕发的南洋大学学生会 (代序)

李元瑾

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出版的“南洋人文丛书”之“南洋大学历史研究”系列，分别以专著、论文集和口述历史的类别面世，本书——《炽热年代、铿锵声音：南洋大学学生会文献汇编（1956–1964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汇编》）则为文献史料的选编，是另一类别。这一类别有其自身的价值，因为史料的收集和编析是保存南大历史的重要步骤，也是呈现南大历史的另一种方式。

南洋大学从陈六使1953年4月发表“创立南洋大学宣言”，直到1980年8月举行最后一届（第21届）毕业典礼，走过27个年头。这段充满戏剧性的岁月，留下许多珍贵的史料有待后人去挖掘、整理、编析和出版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南洋大学的史料汇编不是一片空白，这半个世纪以来已有一些积累。这些成果大致可分几种：一种是南洋大学存在期间阶段性的史料汇编，如《南洋大学创校史》、¹《南洋大学概况》（*Some Aspects of Nanyang University*）、²《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（1956–1966）》³ 以及各年度的大学概况和简介

¹ 《南洋大学创校史》（新加坡：南洋文化出版社，1956）。

² Nanyang University, *Some Aspects of Nanyang University* (Singapore: Universit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 Exposition, 1959).

³ 《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（1956–1966）》（新加坡：南洋大学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会，1966）。

等；一种是1980年后出版的概括南洋大学整段历史的史料汇编，其中包括以集合简史、年表、文献和统计资料而成的《南洋大学史料汇编》、⁴《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》⁵以及把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历史联系在一起的《呵 这五十年：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（1955-2005）》；⁶另外，还有一种是以图片方式呈现的图片集，《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》⁷即是。

史料的收集与编析可以有两种重要类别，一类是纵向的、比较宏观的，一类是横切的、偏向微观的，两种做法各有其价值和意义，彼此相辅相成。上述几本南大史料汇编都是属于第一类别，也就是从纵向的、宏观的角度勾勒南大发展的概况。这种编法的优点是得以展现南大历史的脉络与走向，让读者能够一览历史的概貌，缺点则是无法为重要的南大课题作全面和深入的史料收集与编析。从学术角度和史料深度来看，第二种类别，即横切面、微观式的史料编析非常重要，它可以补充第一种类别难以旁及和深入的资料，使一些课题或专题的面貌更加清晰。南大历史的学术工作也需要往这个方向拓展。就因为如此，中心的一些学者在从事专题研究时，便有意识地收集相关史料，同时计划在专题研究告一段落后继续搜寻史料，最后将史料梳理、筛选、分类与分析。本《汇编》就是在这样的构思和策划下产生。它是建立在“南洋大学历史研究”系列第一本专著《理想与现实：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（1956-1964）》⁸的

⁴ 南洋大学史料汇编编委会《南洋大学史料汇编》（吉隆坡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，1990）。

⁵ 李业霖编《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》（吉隆坡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，2002）。

⁶ 王如明编撰《呵 这五十年：南洋大学创办五十周年纪念（1955-2005）》（新加坡：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，2005）。

⁷ 纪宝坤、崔贵强编著《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》（新加坡：华裔馆，2000）。

⁸ 丘淑玲《理想与现实：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（1956-1964）》（新加坡：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、八方文化创作室，2006）。

基础上，也是第一部采取微观与横向的角度完成的南大史料汇编。而《汇编》的主编丘淑玲便是有关专著的作者。

特殊的时代与环境缔造了一部传奇式的、悲剧性的南洋大学历史。无论是南洋大学的诞生或发展，还是创办人或校长、学生组织或学潮，亦或是评议大学的报告书、大学改制与关闭、校园建筑、校友会……都值得进行微观的探讨，其中南洋大学学生会（以下简称“学生会”）自是南大史的重要章节。学生会是南大生的最高组织，具有服务学生、辅助学校、沟通各界的功能，也是实践“自治”理念的重要场所。它统领南大生参与各个阶段的大学建设，对各种南大问题扮演监督者的角色，后来甚至投入学潮和社会洪流之中。学生会的史料，足以反映知识分子的思想、大学的处境、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变迁等，因此十分之珍贵。

有关《汇编》的断限、选材和编排，编者在她的“绪言”里已作了交待，这里不再赘述。《汇编》以事为点、以时为线，为史料进行选编。纵横交错之下，读者得以窥探1956年至1964年南洋大学学生会的画面，以及许多相关的图景。本书首先反映的是学生会与学生的状貌。翻阅学生会的文献，读者能够看到学生对南大生身份的自豪和对学习的积极态度，同时也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跳跃。学生会成立初期，“建设南大”是经常出现的口号，也是该会重要的会务方针。学生们热爱南大，希望通过“物质”和“精神”两方面来为大学作出贡献。在物质建设方面，学生会协助大学筹募建校基金、协调大学落成典礼工作，并对各种校内硬体设施的改善提出建议；在精神建设方面，学生会鼓励同学自我充实、为南大争光。在“爱校”的理念下，学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，例如筹建学生楼、举办大学周、美化校园等。其中，学生楼是由各届执委会以“接力”的方式，四处筹款，花了五年多才建成的学生活动中心，前后共耗费约60万元。直至今日，该楼仍屹立于南洋理工大学第二餐厅斜对面的山坡上。大学周是一项两年一度的综合学术、

艺术、文娱等的全校性大型活动，通过各学会的合作，以展览、出版、竞赛、演出等方式呈现，增加社会人士对南大的了解。而美化校园则是让南大荒芜角落披上新装的一项全校总动员活动，美化的范围包括南大湖和学生岗。今天南大湖的绮丽景观，便是当年学生挥洒汗水后的成果。这些精彩的片断，都在学生会史料中闪现。

南大创办后便得迎接严峻的挑战，对内面对经费、制度、行政等问题，对外又遭遇政府不承认学位、不资助经费的困难。基于爱校心理，学生对南大问题几乎是全面追踪、清楚表态。前后不到八年，它针对南大课题所发表的声明、备忘录、建议书、信件等多达数十篇，给后人留下大量史料。学生会视协助南大发展为己任，其对解决南大问题所表现出的积极和高效率叫人刮目相看。

《白里斯葛报告书》公布后不到一个月，⁹ 学生会执委会即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声明，针对这份数十页的报告书作了全面的评析。这份声明虽然多处驳斥报告书，却也保持“无则加勉，有则改之”的客观态度。它指出报告书的缺点，例如没考虑南大的创立背景、评估时间太仓促、不应以高标准来衡量一所新大学等；但也建议大学正视报告书所提出的一些制度和设施方面的问题，如改革行政制度、聘请校长等。及至《魏雅聆报告书》公布，政府宣布对南大的政策，提出以谈判方式解决南大问题，学生会便意识到南大问题已经进入另一阶段。对于政府坚持在南大按照《魏雅聆报告书》改组后才给予资助的做法，学生会加以反对，认为这将损害南大作为华文大学的本质和自主权。当政府与南大当局的谈判僵持不下时，学生会力挺南大理事会，成为南大代表的有力后盾；与此同时，它也成为政府眼中“南大问题”的一部分。

⁹ 《白里斯葛报告书》于1959年7月22日公布，学生会的声明发表于1959年8月18日出版的第十期《大学论坛》。

除了南大问题，学生会也关心校外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的发展。19世纪以来，华文教育的存亡绝续一直牵动着新马华人的心。二战以后，华文教育危机四伏，政府通过几项不利华校发展的法令，采取各种重视英文教育的措施，激发了华社维护华文教育的决心，而作为华校生最高组织的学生会，更觉责无旁贷。学生会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华教问题，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四改制，更是不遗余力地追踪。他们反对中四改制，多次召开座谈会，还卷入1961年新加坡中学生为抗议中四改制而发动的罢考事件。值得强调的是，当时新马尚未分家，两地华校生的思想和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。这种华校情结，在新加坡已随着华文教育发展的消退而逐渐淡化，或只残留在老一辈华校生的记忆里。但是，对马来西亚的华社而言，这种感觉和经历并不陌生，因为捍卫华文教育的情节迄今仍在当地上演。正因如此，学生会这方面的文献，依然存在某些现实意义。对拥有华文教育背景的人士来说，今日重读这些史料，仍然感触甚深，为字里行间的忧患意识所牵引。

南大问题与华文教育问题，使学生会与政府的关系恶化，一种抗争模式逐步形成，并且从言论上的抗争走向行动上的抗争。1963年之前，南大学生会主要在言论上进行抗争，为华教遭受不平等待遇、为学生会出版受到严厉管制，提出抗议。自1963年下半年开始，新加坡的政治局势随着政府决定加入马来西亚而变得紧张，朝野两大政党——人民行动党和社会主义阵线的斗争进入白热化。当学生会选择在9月的大选中为社阵助选时，其抗争已进入行动阶段。1963年大选结束，新加坡政治部即刻在南大校园展开两次逮捕行动，引发学生会行动抗争的全面爆发，最终导致学生会的落幕。掀开尘封的故纸堆，人们可以听到那个年代，南大生愤怒的抗议声和急促的脚步声。

学生会的抗争，不仅从言论转为行动、从校园内走向校园外，而且也从教育争执发展到政治角力，读者可以从《汇编》窥探这种

变化。南大与政治，一直是南大史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。这所大学，因其民办的某些特质和华族色彩，从创办开始就不曾摆脱过跟政治的纠缠，其改革、学潮甚至至于关闭，无不与政治挂钩。当时，新加坡政府为了施行以英文教育为主的教育制度，要求南大根据官方蓝图改制。因为涉及大学本质和控制权的敏感问题，南大当局无法妥协，致使改革谈判的过程一波三折。其间，学生会以学生代表的身份，紧密跟踪、积极发言，对政府造成不小的压力。与政府周旋的结果是，学生会的言行无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。当政府对学生的活动、言论和出版进行监视和压制时，学生会作出理直气壮的抗议与反驳。虽然南大领导人一再强调南大不可涉及政治，但到了60年代中期，南大已置身于政治漩涡之中。1963年，十名南大毕业生以社阵候选人身份参选，南大生毫不掩饰地支持标榜左派的社阵，把这场政治角力推向高潮。随后的大逮捕，是执政当局对南大的“政治肃清”。南大在整个60年代几乎被政治气氛所笼罩。《汇编》有关南大学潮的文献，即深刻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动荡以及学生的激情。

学生会之所以有着浓厚的政治意识，也跟整个大时代的思潮发展有关。50、60年代是左倾思潮引领风骚的年代，青年学子在左倾思想、反殖思潮的影响下，对现实和理想有很高的要求和追求。他们不仅致力于维护自身文化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，还与国际接轨，与各国学生互通声息。学生会支持国际上的学生运动、妇女解放运动、反殖斗争等，谴责国际上不平等和受压迫的现象，如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、南韩屠杀学生事件、刚果总理被杀事件等。为了跟上时代的节奏，学生会领袖还跨出小岛走向世界，与各国学生进行当时盛行的“学生外交”活动。他们到过的国家包括印度、秘鲁、伊拉克、摩洛哥、以色列、印尼、菲律宾、加拿大、瑞士等。这些外交活动多以会议的方式进行，内容涵盖学生福利、学生的任务与角色、国际学生的合作与团结问题、国际政治局势等等。

国际间学生的交流和碰撞，让学生会领导人开拓眼界、建立自信。他们视关心政治、谈论政治为一种责任。在使命感的驱使下，学生们俨然一副政治家的模样，发表“忧国忧民”的言论。《汇编》收集了学生会代表出国开会后的报告和心得，让读者通过这些“学生外交使者”的眼睛窥探当时的局势，以及大学生的理想、热情和抱负。

那是一个不同意识形态、各方利益互相撞击与博弈的年代，学生会与大学之间，学生会与政府之间，学生会与社会之间，大学生之间，有时候可以协调，有时候发生争执，甚至冲突。学生会的言行，不是每次都获得各方的部分赞同或完全的赞同。《汇编》的最后一章，让不同的声音响起。这些认同、质疑或反对的声音，来自校园的学生和团体，来自社会、来自政府、来自媒体等，突显了学生会及其成员具有争议性的一面。《汇编》的安排，避免了史料来源的单一性，也使学生会的图像立体化。

《汇编》所反映的学生会面貌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。当年学生会满腔热情地进行全校性的筹款与劳动，忧心忡忡地参与南大改革，理直气壮地投入学潮、卷入政治，意气风发地进行国际性的“学生外交”……如今这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。随着时代的演变、环境的改变，现代学生的际遇大异于前，他们不必面对政治社会转型期间的矛盾，不必肩负建国和维护自身文化的担子，也就缺少了那个年代的学生所特有的理想与激情。我们不能过度地缅怀过去，也无法停留在某一时段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逝去的年代、那么多热血沸腾的身影，作一些回顾和记录，是很有意义的。本书编者丘淑玲在出版了《理想与现实：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（1956—1964）》之后，再完成这本史料汇编，让两本书围绕着共同的课题，相互印证和补充，也为有兴趣研究南大历史的学者，以及关心南大和南大历史的校友和读者，尽了她个人的心力。